

元宇宙政党政治:议题、风险与治理

孙会岩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4)

摘要:随着数字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作为信息技术革命最新表现的元宇宙已经进入到政党政治领域,正在成为改变政党政治的重要参数。元宇宙能够从多个层面赋能政党政治:虚拟与现实融合提升了意识形态传播效果;实时交互与沉浸增强了民众政治参与水平;多重信息技术叠加推动了社会治理智能化,且元宇宙日益成为影响国家主权安全的新场域。面对这一新型政治力量,已有部分政党开始调试自身策略,充分挖掘元宇宙潜在的政治意蕴,以推动政党政治智能化发展。然而,当组织制度、资源结构、权力关系没有和技术协调演进时,元宇宙的发展也会给意识形态、民主政治、社会治理、主权安全等政党政治要素带来诸多潜在风险。因此,需要引入“顶层设计-制度体系-多方合作-社会伦理”的协同治理框架,通过顶层设计平衡技术逻辑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增强元宇宙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强化社会伦理弥补技术治理不足,进而将政党、政府、企业、民众纳入到元宇宙政党政治治理过程中,以实现价值、制度与技术耦合的协同治理体系。

关键词:虚拟现实;元宇宙;政党政治;风险;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D 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2)04-0096-10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随着 3D 设备、VR 系统、5G 通讯、区块链等快速叠加升级,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催生的权力与资本共生的数字社会形态“元宇宙”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和公众生活,这对传统的经济社会运行和政党政治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在元宇宙中实现有序的政治生活与良善的时空治理,既是人类面对快速的技术进步时需要认真审视的问题,也是政党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题。

追溯元宇宙的概念史可知,从汉密尔顿的“信息中心”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研究者大多认为信息技术已然延伸了人的能力,元宇宙也是如此。

史蒂芬森·尼尔早在其作品《雪崩》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迭代则促使元宇宙从对虚拟现实的未来想象走向了技术和需求的加速融合。随着元宇宙第一股 Roblox 于 2021 年 3 月在纽交所上市,以及 Facebook 宣布其母公司更名为 Meta,西方学界对元宇宙的关注日益广泛且密切,学者们一致认为元宇宙是一个交互的、沉浸的、复合的、协作的网络集合或虚拟空间^[1]。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封神榜》《西游记》中,也有关于元宇宙的早期设想,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元宇宙尚处于起步阶段。喻国明从经济层面将元宇宙定义为“虚拟与现实高度互通,且由闭环经济体构造的开源平台”^[2];高奇琦从社会层面将其定义为“基

收稿日期:2022-0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研究”(18CDJ004)

作者简介:孙会岩,政治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政党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技术政治、政党政治研究。

于用户自主创造的超时空交互数字社区”^[3];胡泳等从技术层面将元宇宙抽象为一套依托网络技术的全面数字化媒介系统,这一系统有赖于有机、互联、稳定、循环的数字集合^[4]。可见,元宇宙是通过信息技术构建的区别于自然宇宙的数字虚拟宇宙,这一虚拟宇宙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自然宇宙元素,且能在技术赋权的基础上给人类提供自由创造且超越时空的智能平台。

通过对元宇宙进行宽泛界定后,可以进一步提炼出这一集合概念的内在特征:一是多重技术叠加。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多重技术叠加带来 $1+1>2$ 的整体功效,基于这一点可将元宇宙视为“算法时代”^[5]的产物;二是虚拟与现实融合。在技术叠加影响下,现实世界的景象轻而易举就能映射或衍生至虚拟世界中,形成由“人”组成的3D虚拟“第二身份”,“即人类与虚拟世界的互动是由人类的物理身体和感官提供,而它们本身并不是虚拟的”^[6],虚拟化身、数字所有权与线下世界的认知、情感等具备高度融合性;三是实时交互与沉浸。在前两个特征基础上,虚拟现实向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乃至扩展现实快速发展,能够为用户提供立体的交互方式和更为沉浸的体验。总之,作为人类创造物的元宇宙同样具备人类交往的诸多特性,随着信息技术的更迭,不同的参与者会继续丰富和深化元宇宙的意蕴,进而推动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三维立体的数字场域,元宇宙的特征也会随之不断演变、不断发展。

现代政党政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技术革命的产物,信息技术进步改变了政党的政治整合与表达功能。如今的元宇宙虽然日益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但本质上处理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问题,这与现实社会的政党政治运行方式密切关联。现实社会中,为了政治用途而进行的技术改进和升级在没有改变政党政治的本质属性的情况下增强了政党的时代适应性。在元宇宙视野下,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隔进一步模糊,人机交互无限接近,数字算法为大规模组织动员和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数字身份短时间构筑的虚拟文化对意识形态不断解构与重构,导致政治关系可预测性日益减弱、政治生活碎片化日益增强,进而对政党政治

产生深远影响。但诚如弗兰泽奇所言,“虽然说新技术最初确实威胁了政党的生存,但那些技术中的许多也可以被用来巩固政党的地位。”^[7]元宇宙在带来数字化和虚拟化的同时,也为政治整合提供了新载体,政党政治运行方式也会随之发生转向,政党需要更加关注虚拟平台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虚拟与现实交织影响下的政治参与水平、算法变革带来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以及政治安全等议题。与此同时,隐藏在其中的自由意识异化、数字历史虚无主义、代际技术鸿沟等诸多潜在风险也将随之显现,“技术利维坦”给政党政治带来的异化力量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综上所述,技术与政党的“互塑”过程正在成为政党政治领域需要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当政治体制吸纳信息技术时,技术政治涵盖了技术对有生命及无生命对象加以改造、支配和调整的过程”^[8]。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元宇宙政党政治,阐述元宇宙在政党政治领域已经引发及可能引发的主要议题,并从技术治理的维度探讨元宇宙对政党政治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而提出元宇宙快速发展下政党治理的多元协同路径,以期对元宇宙政党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些启发。

二、元宇宙赋能政党政治的主要议题

随着元宇宙的广泛应用,其日渐成为一股改变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力量,推动形成了一种人、物和机器多元交互的虚拟与现实融合的技术政治模式。对此,已有部分政党开始调试自身策略,挖掘元宇宙潜在的政治意蕴,其中既包括硬件设备和技术的支持,也涉及更高级层面的认同、价值与文化,进而推动政党政治的智能化发展。

(一)虚拟与现实融合提升意识形态传播效果

从意识形态维度看,政党是指一群价值观念接近的人为本阶级利益而结合起来共同奋斗的组织有机体,意识形态整合与传输能力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整合具有吸引力的信息有效动员民众,对自身成功而言至关重

要。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特别是虚拟符号和图像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日益趋向“后古典和后人道主义”形式,虚拟与现实融合将公众舆论、民众诉求更多地展现在虚拟世界中,一些西方政党开始注重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传播。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有媒介机构专门制作虚拟现实3D电影,使政党的支持者可以沉浸在竞选活动中,给受众以更加真实的体验^[9]。无独有偶,Facebook也将大量用户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通过细分目标定位(STP)策略,利用虚拟算法将使用者划分为不同群体,在取得商业成功后,随即开发“Facebook for Politics(FfP)”工具为政党意识形态传播服务,政党可以使用该工具有效地影响戒备心较弱的用户,使他们无意接受政党竞选者所期望的选举观点。2020年7月,《纽约时报》推出将文字故事与动态3D现实场景相结合的信息传播模式,使用者只需滑动手指就可以体验到虚拟与现实相融合的效果,这为政党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加持下,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范式基础上正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传播关系,政党通过虚拟算法阅读受众的心理信号进而实现更加精准的传播。对于政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而言,这种新的传播关系更便于实现话语转换的体验性与时效性,使得政党对民众心态的把握和政治动员变得越来越精准^[10]。正如马修·辛德曼所言,赛博空间将会成为政治辩论的喧嚣场所^[11],在元宇宙影响下,政党领袖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模式以及与媒介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日渐虚拟化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不断增多的数字化技术投入,意味着元宇宙与新的政治力量日益结合在一起,正在**重塑意识形态传播和政党竞争**的议程。

(二)实时交互与沉浸增强民众政治参与水平

技术影响下的政治参与一直是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线上媒体逐步成为民众政治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虚拟现实技术重燃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元宇宙的组织形式有助于动员现实中政治参与不活跃的民众参与虚拟政治。一方面,元宇宙在虚拟世界中构建出一种新型政治参与关系。元宇宙中的政治关系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上演”,而

且也在机器人技术、数字算法、虚拟现实系统等“非人类行动者”中发挥作用。元宇宙的应用不仅降低了整个政治参与过程的通信成本,还意味着政党能更便捷地获取来自组织、消费者、专业机构的重要意见。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更多微观个体的数据都能保存在元宇宙中,其中既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体也包括所谓的“代理”,政党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把民众的诉求更好地整合起来,为政治决策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元宇宙中的公共权力分配日益提上日程。曼纽尔·卡斯特指出,“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支配性领域的范式里组织起来,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以致穿透与修改现实权力和经验”^[12]。元宇宙大大缩短了信息获取与政治决策之间的时空距离,权力中心走向虚拟世界,决策不再单纯依赖于现实中的政党,也依赖于那些真正管理和参与元宇宙的人。技术的有效性改变了政治信息的效率,也改变着政治信息的潜力,一些组织和个人更加愿意通过元宇宙参与到公共权力分配中来,日益推动一种新型的权力分配方式的形成。总之,社会数字化转型贯穿于现代人类发展的历史,并且以一种新方式影响着社会政治空间的结构。在实时交互与沉浸影响下,元宇宙中的政治参与具有再分配公共权力的特点,有时元宇宙参与者与政党政府合作,有时他们则联合其他组织进行运转或独立完成目标。

(三)多重信息技术叠加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

经过金融资本在虚拟现实领域的助推,VR、AI、5G等技术应用的重要性日益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使得社会治理中自行演化出许多符合元宇宙内在情景特征的数字主体。在此背景下,敏捷治理作为一种多重信息技术叠加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被视为助推组织行为向更高层次演进的途径之一^[13]。具体而言,社会治理智能化具有以下几方面典型特征:其一,强调治理节奏与技术进度结合,实现治理对技术的深度融合。如政府快速跟进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治理实践,密切关注元宇宙技术链中5G、云计算、AI等的创新应用场景,积极创建虚拟博物馆、虚拟校园、数字图书馆等,为民众生活提供便利。其二,拓展技术融入治理的精细化

模式,探索跨界治理方法与工具。随着智能手机不断升级为具有更大计算能力的虚拟集成器,数字化设备会携带更多的传感器,虚拟现实模拟人类行为的能力将更为精细,元宇宙能够更加便利地为民众提供“心理真实的”^[14](P136)模拟。如全球最大的VR培训平台STRIVR已经和沃尔玛深度合作开展了超过600万次培训课程,通过模拟传统培训中难以实现的客户服务、处理困难对话等场景,大大提升了培训效果。其三,搭建技术融合平台,构建虚拟监控、自动分析、快速研判的智能政务生态。智能政务平台能够帮助政府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政务系统,把各种技术背后的主体纳入到社会治理范畴中,实现社会的众智之治。如巴西通过智能算法对线上内容进行数据对比和心理模拟,极大提高了侦查腐败案件的效率。随着普适算力的日渐普及,无线设备和智能算法一起构成元宇宙的“眼睛”和“耳朵”,虚拟和现实空间的相互融合让社会生活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市民社会也将由此诞生^[15]。

(四)元宇宙日益成为影响国家主权安全的新场域

元宇宙的去中心属性使其倾向于摆脱原有民族国家和政治结构,用户的关注点具有跨国性,并且运用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影响的方案处理很多问题,因此,这一新生事物对国家主权安全的影响是现代政党政治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元宇宙的主权安全日益被提上日程。早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之初,研究者们就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如今的元宇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具备“国家安全”意义,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的进步为人类展示了在虚拟空间内拓殖、发展的可能性。如巴巴多斯宣布于2022年1月正式在元宇宙中建立数字大使馆。此外,今天的数字地图已不再直接指向国家与城市的自然地理,而是建构起一种作为管理实体的虚拟空间,这些无不预示着元宇宙主权安全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元宇宙正在成为军事和暴力的新场域。一些大国正积极加强网络空间的军事投入,国际网络军事化发展愈演愈烈^[16],技术战已成为政治(或政策)的延伸,它由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主

导,日益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随着技术发展,军事和暴力领域显然也会成为元宇宙的重要应用场景,如虚拟现实就被充分运用到军事训练中^[17];此外,充分利用传感器和数据链构建的数字透明战场,以及利用算法技术进行的智能对抗等,都充分体现了元宇宙的军事应用。在可见的未来,利用更多的传感器和虚拟设备,让远程武器操作者更安全、更真切地感知环境和对手信息,进一步降低本方的人员伤亡,将是军事大国“网军”建设的必然选择。除此之外,一些政党政府正在加大对元宇宙的投入力度,在城市治安维护、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领域进行探索,积极运用元宇宙有效替代真实的人员行动,从而保障国家安全。

三、“技术利维坦”给政党政治带来的潜在风险

复盘政党发展史不难发现,技术既可以为政党政治服务,也可以损害政党的利益。元宇宙也是如此,它既可以是协助政党政治发展的有效工具,也可能成为导致政党异化的力量。当组织制度、资源结构、权力关系没有和元宇宙同步更迭时,“技术利维坦”便会给意识形态、民主政治、社会治理、主权安全等带来诸多潜在风险。

(一)虚拟沉浸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尼尔·波斯曼指出,“新技术中间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18]。元宇宙的开放性、匿名性为新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散播提供了天然土壤,这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稳定性造成很大冲击。如Facebook试图通过更名为Meta赋予用户全新的身份认同,这无形中剥离了政党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共同记忆,容易催生“数字历史虚无主义”。现代政党的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合信息的能力,但由于元宇宙的虚拟特性,传统的政治动员日益显现出“失灵”的态势,西方精英化、官僚化、“卡特尔”化的政党开始变得难以为继,加剧了西方政治选举的个人化、媒体化倾向。一些组织和个体通过煽动元宇宙的

公共舆论,试图重塑公众话语权,以此来扭曲民众的思想观念,这给现实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带来很大风险;还有些具有反社会倾向或阴谋倾向的人通过元宇宙与其他人进行联盟,进一步**加强自身偏执和狭隘的世界观**。

此外,信息技术革命意味着民主成长越来越成为信息富有和通信密集的过程^[9]。在数字化大潮中,信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变得越来越便利,而“信息的富裕也造成了注意力的匮乏”^[20],技术的开放性使得超级链接指向元宇宙的任何地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赢家通吃”的模式,政党这一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绕过去。由于受众越来越意识到自身与选举过程无关,一些西方政党已经很难发动投票者自愿参与选举活动,这推动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运动出现在虚拟世界中,从而既使得投票人逐渐偏离党派中心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党的无关紧要性。总之,随着虚拟沉浸的发展,元宇宙为数字文化的野蛮生长开辟了新的空间,政党正在日益走向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时代,而政党组织在竞选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如果不合理规范元宇宙的价值文化,**势必会加剧主流意识形态的失灵,从而削弱政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二)资本逻辑下的数字技术失控风险

在技术创新、开发与应用快速发展的今天,市场背后的资本逻辑驱动着技术发展,数字技术发展也反映出其背后资本操纵者的价值观念和预期目标。在商业资本、技术创新的全面参与下,元宇宙不仅是一种数字资源,还是一种能给拥有者带来丰厚利润的“数字资本”^[21]。由于元宇宙开发需要丰富的技术储备、良好的数据基础与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目前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均为互联网企业,这给相关技术的稳定性带来一定挑战。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元宇宙的技术局限。技术史学者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发展存在着固有的循环,为解决老问题去采用新技术,新技术又引起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要诉诸更新的技术。”^[22]企业推动元宇宙开发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其行为逻辑并非是为了真正推动技术进步。很多互联网公司收购大量相关虚拟现实产业、产品和技术,

同时通过数据分析向受众输送数字产品,以实现元宇宙的垄断。以提供元宇宙游戏平台的Roblox公司为例,在获得充足流量后,其月收入近1.7亿美元,但底层开发技术与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较前期并无明显提升;另据国际数据分析公司IDC的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AR/VR设备出货量达1123万台,同比增长92.1%,依然具有很大市场潜力。未来数字寡头企业不可避免地会结成数字联盟,成为元宇宙空间事实上的治理者,这会给元宇宙的技术发展和治理带来很大挑战。

另一方面,技术失控会改变人类发展和文明存在的形态。技术进步不仅给传统市场带来结构性变革,促使买方消费行为的转变,还藐视自由竞争,甚至有可能倾覆现有经济社会的基石^[23]。互联网公司作为技术超级权力的掌握者,对使用者的心智结构以及价值观念会产生很大影响,而数字平台背后的股东或者操纵者,则成为整个元宇宙的“立法者”,这会改变人类的发展模式,使我们不得不对互联网寡头企业背后蕴含的政治权力问题给予高度警惕。如德尔·蒙特所言,“技术加速发展和人类社会模式的变化,使得人类历史进程会朝向某种类似奇点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奇点之后,我们现在熟知的人类社会将不再存在”^[24]。以大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为例,通过运用算法对受众精准画像,并且利用受众的认知偏差,剑桥分析公司在虚拟平台中不断向用户灌输某些特定观念,进而操纵用户的价值判断。总之,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参与其中的人更接近于数字平台里的劳工,在去中心化的结构下,技术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给元宇宙的公共性和平等性带来很大挑战;同时,元宇宙中犯罪的隐蔽性以及难以追踪性,**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也侵蚀着国家公权力存在的治理基础,甚至会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三)新型数字鸿沟下的社会治理风险

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影响下,很多政党和政府对技术治理的依赖性逐步增强,技术逻辑下的治理模式已不再是传统管理中的人与人连接模式,而是衍生出人与数字媒介的关系,这种人机关系容易形成“新型数字鸿沟”^[25]。一方面,地区和国家间

的数字技术水平差异带来社会发展的不平等。虽然元宇宙可以加强不同国家、地区间的连接,但由于网络设施、通讯技术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配,不同地区存在着数字化差异。发达国家拥有对于技术研发和规则设定的绝对话语权,而后发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会造成元宇宙中优质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难以惠及后发国家和偏远地区。此外,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依然会投射到元宇宙中,元宇宙的数字场景设定权会带来新的不平等。依靠数字化知识和技术获得财富的主要是富裕国家,而技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则依然陷于“信息贫困”和“技术贫困”。

另一方面,不同群体间技术应用差异带来新的数字剥夺感。在元宇宙迅速崛起的今天,强弱关系仍旧适用于描述和解释移动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关系,如元宇宙游戏平台 Roblox 和 Rec Room 的主要用户年龄段在 9-16 岁,当年轻人大量涌入元宇宙中,会产生元宇宙原住民与移民两个群体,二者在数字敏感度、数字能力及数字思维等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老年人和信息穷人作为数字移民的主要代表,基本属于被孤立于元宇宙之外的特殊群体,这些群体处于接入端和使用端的“缺席”状态,容易产生严重的数字剥夺感,很难适应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进程。总之,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广泛实施,不同群体在设备接入、数字技能、数字思维方面的本质差异将日益凸显,原有的治理制度会产生张力不足或滞后的风险,如果不能消除既有的不匹配问题或者纳入新的治理要素,元宇宙就会加剧信息分布的不均等程度,从而使数字原住民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权力,数字移民则被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最终技术治理将被异化为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

(四)数字技术霸权下的政治安全风险

从 2020 年 5 月 26 日美国黑人男子被跪杀事件的传播中可以看到,一位普通高中女生的虚拟平台传播行为甚至可以引发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行动,这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虚拟空间对现实世界政治的重大挑战。一方面,元宇宙的快速发展暴露了现有制度约束的滞后性。在数字算法的推动下,民众的隐私空间被技术大大压缩,区块链的透

明性与隐私安全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新技术增加了隐私和安全方面的隐患。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国际层面,关于元宇宙的法律发展都严重滞后,在这一进程中“法律编码”和公共权力管理的有效性并不高。此外,由于缺乏开发虚拟技术和相关软件的道德、伦理基础,导致国家和地区政治安全面临着制度挑战,换言之,如今规范这些技术的法律和制度存在碎片化和低系统化的问题,很难有效引导元宇宙的发展。

另一方面,元宇宙中仍然存在技术霸权,并将由此产生新的“数字殖民地”。佩德罗·多明戈斯指出,“如果网络战争发生,人类就是总指挥,算法就是步兵,而机器学习就像机器人中的西点军校。”^[26] 技术攻击与技术霸权如今已愈演愈烈,很多网络精英正在致力于挖掘元宇宙的数据价值,以发展和监管为由扩大数据的监测范围,而后展开数据的收割和垄断^[27]。此外,元宇宙中充斥的技术成瘾、歧视、骚乱和暴力等问题还会蔓延到现实世界,深刻影响现实世界的政治安全。总之,当数字技术、自主算法系统在政党政治中的应用持续增多,特别是本就在技术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逐渐占据更多支配权及主动权时,技术垄断在国家意志层面便会扩张为一种技术霸权,并在跨国竞争中含有剥削和压迫的企图,进而对政治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四、协同治理:元宇宙视野下政党政治的未来图景

元宇宙正在成为政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奇点,它的“双刃剑”特点给政党政治带来很大影响,需要我们把握其发展逻辑进而形成良性的治理进路。因此,要将人民至上理念贯穿于元宇宙治理进程,以制度创新提升治理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构建“理念-制度-合作-伦理”的治理模式,进而实现价值、制度和技术耦合下的多元协同治理图景。

(一)顶层设计层面平衡技术逻辑与公共价值

科学的顶层设计是元宇宙合理发展的前提,而作为规则构建者的执政党,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元宇宙的技术逻辑与公共价值。一方面,要积极

发挥执政党的作用,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在元宇宙治理中,广大民众的满意程度是判断治理水平的核心标准,只有将技术进步与人类发展有机结合,才能保持元宇宙的公共性。2020年,英国发布了《国家数字孪生体原则》,阐述构建数字化国家的价值、标准、原则及路线图;2021年11月底,韩国提出“元宇宙首尔基本计划”,提出要在5年内建立“元宇宙”平台,规划了元宇宙、区块链等相关技术的未来方向,成为世界上首个从政治层面规划元宇宙的国家。就我国而言,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围绕元宇宙和相关产业发展方向展开热议。近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元宇宙研究中心,以期党和政府科学应对元宇宙提供智力支持。随着虚拟现实的成长和新技术的产业化趋势日益凸显,执政党更应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从战略高度引领元宇宙的公共价值,使其切实为民众服务。

另一方面,政府应介入元宇宙系统设计中,维护元宇宙的安全属性。近年来发生的互联网垄断和数字化金融争议,给元宇宙的有序发展蒙上一层阴霾。有鉴于此,政府要积极参与到元宇宙系统设计中去,减少并降低元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技术漏洞和风险。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近年来十分关注面部识别算法所涉及的数据风险,适时将违法算法关闭;新加坡政府搭建了“虚拟新加坡”平台,用于城市规划、维护和灾害预警项目。2022年1月,我国网信办、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剑指不良算法行为;近日,无锡、上海、厦门等地政府密集出台涉及元宇宙、虚拟现实的相关政策和文件,从政策层面规避相关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总之,在顶层设计层面,政党和政府应制定关于元宇宙的宏观政策,聚力推进技术行业的公共价值培育,激励行业与资本市场合力打造新型政企发展模式,改变传统治理中顶层设计落后于技术行业发展实际的局面,将元宇宙的治理纳入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

(二) 制度建设层面构建技术与制度融合的保障体系

元宇宙为人类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新的载体,但

元宇宙并不是法外之地,最终还是要受到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的约束^[20]。“社会数字化”不仅会推动现行立法体制的变革,而且会促使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理论与法律文化发生改变,这为我们构建技术与制度融合的保障体系大有裨益。一方面,要建立虚拟技术复核制度,规避技术滥用。技术赋能所带来的风险不仅需要通过技术的发展来妥善解决,更需要构建合理的技术复核制度,对已有制度进行前瞻性重塑与调试,如美国的《数据科学战略计划》、英国的《数字宪章》等就将人与技术工具统筹起来,进一步强化技术的稳定性。此外,部分国家还在探索建立虚拟经济规则体系,规定企业在挖掘数据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要保障数据安全以及信息的合理流动。未来还需要构建数据平台协作与融合的制度生态,对违反隐私安全和监管限制的个人、团体或企业实施严厉处罚,消除数据壁垒,以真正实现“技术向善”。

另一方面,要推进技术无障碍制度建设,打破元宇宙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生产不平等的延续,元宇宙同样对数字鸿沟进行了再生产。未来的虚拟现实治理中,要适当地考虑技术实际使用者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对于治理中的“数字弱势群体”,要不断提升其数字技术能力,探索建立数字服务规则,帮助其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要调整公共服务方式,出台“适老化”公共服务内容,将传统服务与智能创新服务有机结合,联动线上线下平台,关照“信息贫困人口”的需求;此外,还需要对元宇宙前端数据采集设备的用户隐私协议持续进行监管,保障用户的技术安全感。总之,利用制度建设规范元宇宙发展是大势所趋,应当通过规范性的流程再造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来对元宇宙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精准预测,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进而实现对民众需求的制度回应以及为民众提供更好的体验环境。

(三) 多元协同层面多方合作共建元宇宙治理体系

元宇宙的多元技术叠加特性也预示着对元宇宙的治理需要跨学科、跨行业以及跨国协作。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纠缠发展,导致依靠单一治理

主体很难满足元宇宙的治理要求,因此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合作治理尤为重要,必须不断打破行业壁垒,强化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合作关系,实现多元协同治理^[20]。在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中,企业应发挥主体作用,完善算法设计。数字技术的虚拟化架构和形态,决定了人类需要依靠技术企业来管理可用的信息及数据。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公司通过元宇宙空间对未来社会进行控制具有很大可能性^[21]。技术嵌入制度引发的风险,也需要通过技术的发展予以妥善解决,虚拟世界不是无序的世界,而应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并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世界。仅2022年一季度,华为、OPPO、vivo、小米等企业已经成功申请10余项与VR/AR有关的专利,未来的企业需要通过大数据算法、信息挖掘、自然语言理解等手段,建立权威的技术研究与安全中心,共同创建一个为民众提供深度保障的公共数据平台。

与此同时,要加强国际政治合作,构建国际应用法则。在元宇宙视野下,单个国家已无法仅凭自身力量来使其民众免受影响,这意味着需要构建“复杂相互依赖”的合作场域,并且建立相关国际政策机制的时机日益成熟^[22]。原有的计算机结构以及互联网OSI模型等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改进,确保形成一套完善的政治合作战略和社会合作机制。因此,在使用数字技术和引进元宇宙过程中,建立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与合作机制必不可少,只有扭转原本单边主义痕迹明显的治理思路、通过各国政党政府之间的相互协作才能塑造更好的未来。总之,对于占据市场控制地位的超级平台来说,“数字化的手”是它们掌握的利器,但随着企业与超级平台在元宇宙领域的实践不断深入,单靠任何一方都很难有效把握这一利器,正确的方式是鼓励国际政治和技术主体进行充分合作,共建元宇宙的有效治理体系。

(四) 社会伦理层面依托契约精神提升技术道德水平

技术尤其是革命性的技术会产生许多伦理道德问题,我们只有看到潜在的道德风险,才能有目的地采取相应技术并正确地使用它们^[23]。元宇宙不

像现实世界那样已经构建了一套强大的伦理准则,因此需要在这个新生的虚拟环境中,嵌入适宜人类发展的伦理准则,使元宇宙的发展更有益于人类世界。一方面,需要不断建构元宇宙的相关技术伦理。研究者一致认为需要为元宇宙的发展制定一系列伦理标准,这些伦理标准应当具有一般性并在该领域形成通用的价值要求和道德标准。例如,美国IEEE关于机器人和智能技术的伦理标准中“符合伦理的设计”这一约束很好地表明,自主设备和智能系统应该基于人类价值规范和伦理监管体系来运行,如此才能符合人权和自由的普遍标准。未来还应当深度结合元宇宙的固有特性,积极构建基于虚拟现实的人工智能技术伦理规范和元宇宙道德公约等。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人类本身的社会伦理。共建社会伦理是应对“数字利维坦”的最后防线,如不提升民众的思想觉悟和激发人类社会伦理,出台再多的制度也难以突破“运动式治理”的怪圈,这就需要通过约定使用者的伦理空间,为公众提供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框架,激发使用者的自我意识。如国家网信办近期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就为广民众共建社会伦理、提升数字生活安全感提供了重要保障。未来我们需要重申“社会价值高于技术或商业价值”的主张,加强技术使用的伦理责任规范,促使技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总之,依托契约精神构建社会伦理是元宇宙治理的重要旨归,只有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在企业不断完善技术伦理、广大民众共建社会伦理的基础上,元宇宙领域“算法-利益相关者”的共建共治共享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

五、余 论

不管是百年前的机械化革命,还是当代的信息化革命,从短期来看都会给人们带来相似的“技术陷阱”,对此人类并不是只能被动接受,而是始终在努力应对。时至今日,世界正在演变为一个人类和技术共存的联合体,它既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弱点^[24](P6)。我们既要包容审慎地看待元宇宙给现代政党政治提供的新动力,又要合力对其进行治理以防止其破坏政治生活的公共价

值。首先,要冷静看待元宇宙对政党政治带来的影响。元宇宙与传统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创设了与现实物理世界平行但又相互联系的数字世界,参与者可以借助穿戴设备进入提供真实沉浸感受的数字世界,这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存、交往、劳动与发展的逻辑。作为一种带有未来取向的组织理念,元宇宙已然在教育、游戏、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先行试验,接下来能否催生出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对此我们总体上要持冷静乐观的态度。其次,要积极引导元宇宙为提升现代政党功能服务。面对虚拟现实发展与政党政治变革,各国政党都面临着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再造、政党重塑等问题,唯有未雨绸缪、顺势而为才是有效应对之举。我们需要找到政党发展的方向,不被技术进步的大潮甩在身后,最终共同制定治理标准、伦理框架等,以确保元宇宙摆脱虚拟化陷阱,成为人类文明跃升的奇点而不是歧点。总之,元宇宙政党政治是一个新兴发展的领域,其特征是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由于被高估或低估所带来的悖论,只有推动政党理念、数字化技术、制度规范实现有机融合,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性行为理顺潜在的技术治理混乱,才能实现元宇宙下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 [1] Haihan Duan, Jiaye Li, Sizheng Fan et al. Metaverse for social good: A university campus prototype[A].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C]. 2021. 153-161.
- [2] 喻国明.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 “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 新闻界, 2021, (10): 54-60.
- [3] 高奇琦, 隋晓周. 元宇宙的政治社会风险及其防治[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 1-12.
- [4] 胡泳, 刘纯懿. “元宇宙社会”: 话语之外的内在潜能与变革影响[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 (1): 106-116.
- [5] Cathy O'Neil. Life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J]. Science, 2017, 355(6321): 137.
- [6] Mathias Kofoed Ottesen. On the possible phenomenological autonomy of virtual realities[J]. Indo-Pacific Journal of Phenomenology, 2020, 20(1), DOI:10.1080/20797222.2020.1857945.
- [7] (美) 史蒂芬·E. 弗兰泽奇. 技术年代的政党[M]. 李秀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4.
- [8] (美) 兰登·温纳. 自主性技术: 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M]. 杨海燕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02.
- [9] Yatrck Healy et al. Experienc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 virtual reality film[EB/OL]. <https://www.nytimes.com/2016/01/30/us/politics/election-2016-virtual-reality-vr-video.html>, 2022-03-20.
- [10] Ralph Schroeder. Towards a theory of digital media[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 21(3): 323-339.
- [11] (美) 马修·辛德曼. 数字民主的迷思[M]. 唐杰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2.
- [12] (美)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1.
- [13] Ines Mergel, Yiwei Gong, John Bertot. Agile government: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8, 35(2): 291-298.
- [14] (美) 阿莱克斯·彭特兰. 智慧社会: 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M]. 汪小帆, 汪容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 [15] (美) 卡洛·拉蒂, 马修·克劳德尔. 智能城市[M]. 赵磊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164.
- [16] 杜雁芸. 网络空间军事化发展态势及其应对[J]. 太平洋学报, 2021, 29(12): 53-64.
- [17] 何哲. 虚拟化与元宇宙: 人类文明演化的奇点与治理[J]. 电子政务, 2022, (1): 41-53.
- [18] (美) 尼尔·波斯曼. 技术垄断: 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13-14.
- [19] (美) 布鲁斯·宾伯. 信息与美国民主: 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M]. 刘钢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9.
- [20] (美) 詹姆斯·韦伯斯特. 注意力市场: 如何吸引数字时代的受众[M]. 郭石磊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7.
- [21] 李石. 从共享的数字劳动到数字福利的共享[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9(3): 127-133.
- [22] (美) 布莱恩·阿瑟. 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什么, 它是如何进化的[M]. 曹东溟, 王健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5.
- [23] (英) 阿里尔·扎拉奇, (美) 莫里斯·E. 斯图克. 算法的陷阱: 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M]. 余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2.
- [24] (美) 路易斯·德尔·蒙特. 人工智能大爆炸: AI时代的人类命运[M]. 李睿华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9. 135.
- [25] (英) 文森特·米勒. 数字文化精粹[M]. 晏青, 江凌, 姚志文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93.
- [26] (美) 佩德罗·多明戈斯. 终极算法: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M]. 黄芳萍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27.
- [27] Julie E. Cohen. Between truth and power: the legal const-

- ru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59.
- [28] 赵国栋,易欢欢,徐远重.元宇宙[M].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149.
- [29] 尹振涛,徐秀军.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向度与中国方案[J].政治学研究,2021,(4):143-154+160.
- [30] Qinyu Feng,Renjie Cai.“Data Hegemony”:Reflec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etaverse technology in urban design based on digital[J].Journal of World Architecture,2021,5(6):52-61.
- [31]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闻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78.
- [32] (荷)尤瑞恩·范登·霍文.信息技术与道德哲学[M].赵迎欢,宋吉鑫,张勤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3-35.
- 【责任编辑:龚紫钰】

Party Politics under the Metaverse Perspective: Topics, Risks, and the Governance

SUN Hui-ya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4)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people's daily life, the Metaverse, which represent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entered the arena of party politics and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nging party politics. The Metaverse can empower party politics in various ways: the fusion of virtual space and real world enhances the effect of ideology dissemination; real-time communication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 engages more people in politics;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promotes intelligent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us the Metaverse has become a new field affect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Given this new political force, some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gun to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and fully tap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Metaverse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averse will bring many potential risks to the party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deology, democratic politics, social governance, and sovereignty security if organizational systems, resource structures, and power relations do not evolve with technology in a coordinated wa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framework involving top design, institutional system,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and social ethics, balance technical logic and public value through top design, make the Metaverse governance more flexible and effective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uild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model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stakeholders, take advantage of social ethics to complement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nd then engage political parties,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into the Metaverse governance to construct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value, system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 the Metaverse; party politics; risk; coordinated governance